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一辑）

法国革命史（上）

〔德〕威廉·布洛斯（Wilhelm Bloss）著 孙望涛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历史学（第一辑）

法国革命史 (上)

〔德〕威廉·布洛斯 (Wilhelm Blos) 著 孙望涛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德」威廉·布洛斯著 孫望濤 譯

法國革命史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初版

譯者序言

西哲有言：『革命是歷史的機關車。』（K. M.: 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50）這句話取譬真切，無以復加，因為牠以寥寥數字將革命的作用完全表現出來了。在階級制的社會中，即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對抗，他們明爭暗鬥，無時或已，及至風潮劇烈，範圍擴大，終必爆發而演成一種革命。革命不是由少數煽動者的『惡意志』製造出來的，乃是由各階級間的對抗與衝突醞釀而成的。『在革命的暴亂出現之處，必有一種社會的慾望伏在下面，為種種陳腐的制度所遏阻，而不得滿足。』（K. M.: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總之，革命不是一種原因，而是一種結果。在階級對抗的社會中必定產生這種結果，否則這個社會即死氣沉沉，毫無進步可言，正如一列火車沒有機關車拖着，和死屍僵臥路上一樣。所以革命是階級制社會的進化絕對不可少的要素！

『革命呀，革命呀！』這種呼聲在我們中國已有二三十年之久，到現在幾乎人都聽見說過革命，並知道要革命。可是革命到底是什麼，大家却又模模糊糊，弄不清楚，大概以為打手槍，拋炸彈，或轟轟烈烈地打一二仗，把一個當權的人推倒了，就算是革命，其實這樣的把戲去革命還有十萬八千里。

因此革命是什麼，我們倒有說明的必要。這個名詞在西文中爲“Revolution”即『旋轉』之意，用適當的中國話來說，就是『翻個底』。普通分革命爲兩種，即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凡將政權從一個階級轉移到另一階級的手中是

爲政治革命；凡將財產權從一個階級轉移到另一階級的手中，是爲社會革命。或者和德國一個大經濟學者所說的一樣：『每種使舊社會解體的革命是一種社會革命。每種使舊政權崩潰的革命是一種政治革命。』（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 M. und F. E. 1841—1850）所以德意志在一五二五年出現的慘酷的農民戰爭不是一種革命，俄羅斯在一七七三年發生的兇猛的農民暴動也不是一種革命，因爲牠們的目的只在改良統治階級的舊制度而不是要推翻這種制度。此外，如通常用暴力實現的政府變更，殺人盈野的武劇，或窮兇極惡的黨派爭鬥，都不能隨便冒用革命的名稱。只有向來伏處在社會下層的階級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中起來推翻統治階級的組織及其制度文物，而代以一種新的組織和制度文物，才算是一種革命，才算是一種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然所謂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是不能截然劃分的。『世間沒有「純粹政治的」革命：每種革

命是一種社會革命；每一種社會革命是一種政治革命。』(N.B.: Theorie des hist. rischen Materialismus) 更精確些說：『每種真正的革命是一種社會革命，牠使一個新階級達到統治地位，並使這個階級得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社會。』(Internationals aus dem Volkstaat von F.F.)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西大革命就是上面兩種說法的一個好例證，因為牠是一種政治革命，同時又是一種社會革命。

安格爾斯 (Engels) 說：『沒有奴隸制，便沒有希臘的國家，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便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的基礎，也沒有近世的歐洲。我們永不當忘記，我們全部經濟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發達係以一種狀況為前提，而奴隸制在這種狀況中是被認為十分重要和普遍的。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沒有古代的奴隸制，便沒有近世的社會主義。』(F. F.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這一段話最富于教訓，牠告訴我們，社會是一步一步發達下來的，我們要徹底了解現在的社會狀況，必須研究過去的社會狀況，即那種好像和我們風馬牛不相及的奴隸制，竟是近世社會主義一個先決的條件，值得我們的注意。這種說法既是對的，那麼，法蘭西的大革命和現社會有直接的關係，尤當爲我們研究的對象，因爲正和波上特格特 (R. W. Postgate)所說的一樣：『法國大革命是我們現代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母親。』(Postgate, Revolution from 1789-1906) 這種革命的內容怎樣，自然是一言難盡，但我們上面所說的那位大經濟學者對於英法有產階級的革命曾有一段精闢的議論，特介紹于下：『一六四八年和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不是英格蘭與法蘭西的革命，而是歐洲式的革命。牠們不是一個社會階級對一種舊政治制度的勝利；牠們是宣佈新歐洲社會的一種政治制度。有產階級在此等革命中獲得勝利；

但牠的勝利在當時是一種新社會制度的勝利，是國民財產對封建財產的勝利，是整個的民族對部落主義的勝利，是競爭對行會的勝利，是共享權對長子單獨承繼權的勝利，是土地所有人對地主藉土地橫加宰制的勝利，是開明對迷信的勝利，是家庭對家庭姓氏的勝利，是勤勉對英雄式游惰的勝利，是民權對中古時代特權的勝利，一六四八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紀對十六世紀的革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紀對十七世紀的革命。此等革命表現英法以外的世界慾望更甚于表現英法兩國自身的慾望。』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 M. und F. E. 1841—1850 3. Band) 像這樣的革命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尤其是法蘭西的大革命時代更近，趣味更濃，教訓更多，我們生在這個革命時代的中國萬不可不知道牠的事實。

我們既要知道法蘭西的大革命，即不可不讀牠的歷史。然此項歷史在西洋

各國的文字中爲數甚夥，卽在我們中國編的譯的也有兩部；但無論在何國，簡直沒有一部法蘭西革命史可稱完璧。有產階級的學者關於此項歷史的著作，不獨內容淺薄，而且滿懷着階級的成見，任意贊揚或詆毀，他們的作品大半只能與魏收的『穢史』後先媲美，不足以言『信史』。至于從大多數民衆的立場出發的著作，也只有克魯泡特金的法蘭西大革命（Peter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30）與威廉·布洛斯的法蘭西革命史（Wilhelm Bloß: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von 1789 bis 1804）較爲完備。不過克氏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對於革命中的民衆運動——尤其是農民運動——雖能別開生面，紀其大略，但終不免加以無政府主義的渲染，因此真正可爲一般人民讀物的，只剩着布洛斯一書。布氏是用唯物史觀的方法，從經濟的狀況去解釋歷史的現象和事變，所以他的描寫較一般歷史家來得深刻。今特舉例說明如下：

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曾經說過，法蘭西的革命是

思想的一種行爲。(Eine Tat des Gedankens) 這種流行甚廣的唯心論是再錯

也沒有的。法國如果不是因路易諸王的極端專制與昏庸，貴族教士的盡力壓迫

和剝削，使農工業的生產力束縛重重，無從發展，以致全體人民都感受痛苦，決不會

發生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至于十八世紀的哲學對於提倡革命雖不爲無功，然

牠只是此等痛苦的反映，而非革命的原動力。作者深明這種道理，故他首先寫出

舊法國的政治情形和社會狀況，以明大革命的由來；此外，他對於羣衆運動描寫頗

爲詳盡，由此可以觀出歷屆國會代表各種決切的舉動是因何而起。這都是作者

的勝人處。反之，我們試看法國學會列爲第一的路易馬德楞 (Louis Madelin)

的法國大革命史，(中文有譯本) 敘述各種事變是何等膚淺可笑。例如他對於

八月四日晚間各貴族和教士代表在議場中自行拋棄封建特權一事，說這是由于